

革命时期如何过紧日子

□ 中学锋

精兵简政，促进红色政权效能提升

精兵简政是勤俭节约的经典做法。革命根据地的精兵简政主要集中在全面抗战时期。1941年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抗战最艰苦阶段，外有日军的侵略，内有国民党停发军饷和军事经济封锁，根据地财政遇到空前困难。此时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财政收入减少，但脱产人员却从1938年的1.6万人增至1941年的7.3万人，矛盾非常突出，不仅行政效率下降，还大大加重了百姓供养负担。

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民主人士李鼎铭等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可。12月，党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节约人力物力。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革命根据地，要求其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避免民困军愁、坐以待毙。1942年9月，他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指出精兵简政是克服物质困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针对一些同志对这一政策不理解的情况，他运用比喻的手法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精兵简政的重点是严控负担人口与军政人员的比例，缩减军政脱产人员。各根据地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根据“少而精”原则，紧缩编制，因职设人，取消空头机关，编余人员主要是加强基层、转入生产战线，或自愿解甲归田。如晋冀鲁豫边区规定，脱产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能超过全区人员的1%，1942年初到1943年，边区实行了三次简政，仅太行区就缩减6万人，冀南区减少了一半军政人员。边区经过三次简政，共减少人员51%，边区政府由原来548人的编制减少到仅100人。陕甘宁边区1942年进行了第一次精简，共裁减合并机构百余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减少了24%。此后又经过第二次精简，缩减边区一级机关和人员，逐步实行合署办公制度。精兵简政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政府运行也更为高效。

贯彻厉行节约方针，“节省每一个铜板”

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极端困难，为了减少取之于民，争取最广大人民对革命的支持，保证供给革命战争的需要，根据地财政坚持生产和节约两手抓，在发展生产以供自给的前提下，始终把厉行节约作为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对苏区接连不断展开“围剿”，苏区的资源日渐枯竭，党领导的红色政权面临生死存亡危机。为节省经费开支，集中财力保障军需，苏区开展了节省运动，在红军和党政人员中废除薪饷制，实行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供给制，井冈山根据地最初每人每月可发3元钱，后来逐渐减至1元甚至5角，最后实行了供给制。1934年1月，毛泽东强调，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会计制度的原则。3月，人民委员会提出在9个月内节省80万元的号召，各级党组织掀起节省行政经费、节省粮食、自带伙食等运动。

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为尽量减轻对人民的税收负担，争取广大群众参加抗战，党创造性地采取了大生产运动这样的取之于己的办法，同时施行节约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1942年12月颁布《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要求实行节省民力、物力和财力的节约政策，“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应对消耗巨大的战争，党在解放区仍然坚持贯彻厉行节约方针。1946年7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必须作持久打算，十分节省地使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1947年，在元旦的指示中再次指出，必须一面发展生产，一面用大力量整理财政，节省一切非必要的开支，降低干部生活水平，表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严禁铺张浪费、贪污腐化。山东省和苏皖边区从1947年起供应标准都有所降低。比如，山东省地方部队的菜金自己解决一半，地方机关则完全自己解决。单衣除主力部队发两套外，其他一切后方机关人员皆改发一套，鞋子减少一双，衬衣取消。据计算，半年即可节约粮食6000万斤。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韦岗战斗胜利纪念碑碑文敬读

□ 陈彩云 沈小保

在江苏省镇江市西南15公里的高骊山上，耸立着一座巍峨的纪念碑——韦岗战斗胜利纪念碑。纪念碑朝东而立，高25米，碑顶为古铜色的步枪模型，碑身正面刚劲有力的铜铸大字为郭化若受粟裕所托题写的碑名：“韦岗战斗胜利纪念碑”，碑座上端两侧为红旗造型，正面浮雕两侧所刻“1938”“6.17”为韦岗战斗发生日，中间为新四军的标志“N4A”，后部浮雕为韦岗首战告捷后战士们欢欣鼓舞庆祝胜利的画面，两侧分别镌刻着陈毅、粟裕当年盛赞韦岗战斗的诗篇。在纪念碑的正后方，巨大的长方形石碑上镌刻着韦岗战斗胜利纪念碑碑文：

为了铭记新四军抗日将士的丰功伟绩，教育后代，继承和发扬抗战英雄的革命精神，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特在韦岗战斗原址立碑纪念。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平津后，八月十三日又大举进攻上海，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是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江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日寇到处烧杀掠夺奸淫，暴行累累。江南人民奋起抗敌，救亡图存。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全国人民的要求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组成新四军，开赴抗战前线。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指示，从第一、二、三支队所属的第一团至第六团中各抽调一部分干部战士，组成以粟裕为司令员的先遣支队，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进入苏南敌后，实施战略侦察。六月初，新四军第一支队在陈毅司令员率领下，进驻苏南。六月十五日夜，先遣支队和第一支队第二团一部，由粟裕统一指挥，在南京镇江之间的下蜀镇附近破坏铁路，使敌交通一度中断。十七日凌晨二时，该部再接再厉，冒雨继续东进，八时许到达镇（江）句（容）公路之韦岗赣船山口设伏。是时，日寇运输队五辆汽车，由镇江方面开来，进入我军设伏阵地，粟裕率部立即向敌发起猛烈攻击。日寇仓皇应战，龟伏车底与草丛

中顽抗。新四军将士英勇杀敌，仅半时许便将敌歼灭，毙敌土井少佐以下十余名，伤数十名，毁军车四辆，缴长短枪、军刀、钢盔、军旗、军服等大批物资及日钞七千余元，获得大捷。韦岗战斗，是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仗。这一仗，威震江南，挫敌凶焰，鼓我士气，振奋民心，为尔后江南千百次战斗和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揭开了序幕。

镇江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五年九月立

组建先遣支队 挺进江南敌后

1938年春，日军铁蹄践踏之下，江南大好河山日渐沦陷。日军如入无人之境，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江南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救同胞于倒悬，中共中央指示要求新四军抓住有利时机，深入敌后，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创立抗日根据地。根据指示，新四军决定组建先遣支队深入江南敌后。政治上，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持久抗战方针，推动展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上，侦察了解江南地形、民情及敌情，为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开进创造条件。4月，新四军军部抽调成立先遣支队，由粟裕率领，启程皖南，一路向苏南挺进。5月，先遣支队到达苏南敌后，立即组织常州、镇江、南京三个方向的武装侦察工作。6月15日，粟裕率领的战斗连到达下蜀附近，连夜破坏那里的电线、铁路，使次日日军的一列火车出轨，京沪铁路交通一度停顿，顺利完成了阻碍敌人交通的任务。

韦岗设伏 江南首战旗开得胜

江苏镇江为日军占据的重要交通要道，镇（江）句（容）公路每日敌汽来往频繁。下蜀与韦岗相距不远，为扩大战果，根据之前对敌人兵力部署和行动规律的侦察情况，粟裕决定在镇江以西15公里的韦岗设伏，趁热

打铁，打一场伏击战。6月16日，粟裕亲自进行战前动员，挑选精干人员，悉心部署战备。次日凌晨，参战分队冒雨向韦岗急进，做好伏击准备。上午8时许，日军运输车队进入伏击圈，粟裕一声令下，预伏部队向敌军发起猛烈攻击，双方展开激战。新四军击毙击伤土井少佐、梅泽武二郎大尉及以下日军数十名，击毁汽车四辆，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并在增援敌军赶到之前迅速安全转移。韦岗伏击战速战速决，实现了粟裕战前力求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目标。

韦岗告捷，大快人心，军民欢欣鼓舞，共庆胜利。粟裕兴奋题诗《韦岗初胜》：“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韦岗斩土井，处女奏凯还。”陈毅赋诗祝捷：“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申报》《大公报》《救亡日报》等新闻媒体竞相报道战斗胜利。新四军军部对先遣支队的胜利进行了表彰，蒋介石也向新四军军长叶挺致嘉奖电：“所属粟部，袭击卫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仍希督仿继续努力，达成任务。”

开路先锋 烽火燃遍江南

1939年4月，粟裕在《先遣队的回忆》中总结韦岗战斗不仅打击了敌人之横行，而且振奋了广大人民的抗战情绪，提高了他们胜利的信心，亦可以说初步地答谢了各界人士对我军的热望。这一战斗的胜利，不仅奠定了我军进入江南地区的基础，而且开辟了胜利的先声。

新四军江南首战告捷，如同在沉闷的沦陷区炸响了一声惊雷，戳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沉重打击了日寇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一扫扫荡



尘上的“亡国论”和“恐日病”，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斗志，使同胞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展示了新四军的威武雄风和抗战精神，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力，使新四军成为大江南北抗日的光辉旗帜；点燃了江南人民抗日斗争的熊熊烈火，揭开了新四军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序幕；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此后江南敌后到处传来游击队的枪声，新四军驰骋大江南北，先后取得了新丰、句容、江宁等大小百余次战斗胜利，韦岗烽火燃遍江南大地。

时光荏苒，韦岗战斗已过去82年，昔日硝烟弥漫的战场如今已成为一片宁静美丽的山岗，只有那庄严屹立的战斗胜利纪念碑，在默默提醒着我们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幸福生活，时刻铭记先烈们为保卫人民和家园付出的热血和牺牲。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王树声：打回大别山去！

□ 张 偶

带领着农会委员农友去捉拿丁枕鱼。遭遇此番斗争的丁枕鱼威风扫地，然而他非但没有就此罢手，反而伺机报复王树声，趁夜将王树声祖宅付之一炬。王树声旋即带人直捣丁枕鱼老巢，活捉后将其处决。他大义灭亲的事迹不胫而走，更多的农民被号召起来打击其他反动阶级。农民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展开，并从乘马岗迅速向麻城全县蔓延。

源自大别山的星星之火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刚被赶走的土豪劣绅又在大别山区卷土重来。地主豪绅纠集当时活跃在河南光山一带、号称刀枪不入的红枪会向麻城扑来，很快便把县城包围，麻城的农民运动危在旦夕。时任中共麻城县委委员、县农会组织部长的王树声和其他同志一道，迅速组织起一支由农会会员和工人组成的武装力量，决心与来犯之敌殊死一搏。面对红枪会的攻击，守城战士禁不住有点紧张，伏在王树声身边的一个小伙子忍不住悄声问：“国侄哥，听说红枪会喝符念咒，刀枪不入呢。”“吹牛！我不信这群人是钢打铁铸的。”话音刚落王树声就端起枪朝着红枪会的排头开了一枪，排头应声倒地。守城的农会成员们士气大振，随后发起反击，匪徒纷纷抱头鼠窜。麻城保卫战第一役初战得胜。

随后，王树声积极响应党的八七会议号召，在本地区与各反动武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7年11月13日，潘忠汝、王树声等人发起黄麻起

王树声是新中国首次授衔的十位大将之一。他生在大别山、革命在大别山，解放战争时又再次重返大别山，被人们称为“大别山守护神”。

从地主家庭走出的农民领袖

王树声1905年5月生于湖北麻城乘马岗项家冲。他虽然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但并没有过着养尊处优的少爷生活，成长中耳濡目染的是大别山百姓的困苦生活和艰辛劳作。

1923年，18岁的王树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麻城县高等小学。他的堂兄王幼安是这里的国文老师，是董必武的学生，也是一位共产党员。在堂兄的影响下，王树声了解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认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贪官污吏的反动本质。他怀着为改变大别山劳苦大众命运的理想，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和决心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革命要从自家革起。”入党后的王树声首先发动了自己的亲族眷属参加革命，并带头将自己的田地财产分给了穷苦农民。在他的主持下，麻城县第一个乡农民协会在乘马岗成立。就在农民刚刚品味到翻身的甘甜，乘马岗罗家河农会就被地主丁枕鱼带人给破坏了。此人是王树声的舅爷，是当地有名的恶霸，横行乡里吸食民脂民膏。碍于丁枕鱼与王树声之间的亲戚关系，农会对于如何处理丁枕鱼顾虑重重。“要革命就不能讲亲戚情面！”王树声一拍桌子，刚毅果决地说“走，今天就找丁枕鱼算账去！”随即

大别山的儿子，我要再打回大别山！”。

去时还是师长的王树声，再次立马大别山，已是大别山中心的鄂豫军区司令员。国民党调集30多个旅的兵力，企图吞没刘邓大军。王树声利用熟悉大别山区的有利条件，在组织开展创建并巩固根据地工作的同时，率军配合主力与敌人周旋。1948年春，国民党的“清剿”计划破产，我军在大别山站稳了阵脚。11月，淮海战役开始，敌人主力被调去一线，仅留下10多个团留守大别山。王树声抓住机会主动出击，迅速恢复了大别山根据地，不仅有力地配合了淮海战役，还为解放军继续南下建立了桥头堡。

1949年6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迁至武昌，王树声改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大军刚过，本地土匪杂合国民党残留的散兵游勇使得匪患在中南地区极为猖獗，尤以大别山最甚。王树声凭借自己多年在大别山游击的经验，主动请缨进行剿匪。鄂豫皖边区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并由王树声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大别山地区的剿匪工作。王树声将部队分为三线：以进剿、会剿打乱土匪指挥系统；分片驻剿堵截土匪；再组织群众联防阻止土匪流窜。王树声将驻剿和政治工作相结合，深入发动群众铲除匪患滋生的土壤。经过半年多“拉网捕鱼”式的剿匪，歼敌1.54万余人，胜利完成了鄂豫皖边区的剿匪任务。

